

批判转向以来地名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纪小美¹, 王卫平¹, 陈洁¹, 陶卓民^{1*}, 付业勤²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210023; 2. 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海口 571158)

摘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人文地理学在内的国外学术界对传统地名学进行了批判转向,重视剖析地方命名与更名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权力斗争。本文首先评述了批判转向以来,国外地名研究在政治、经济、社会与管理维度上的相关进展;其次,评述了目前国内的政区更名、地名商品化、地名争夺、地名与文化认同等可归为批判地名学范畴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批判转向给国内地名学研究的启示,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快速城镇化背景对地名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地名研究;批判转向;述评;展望

1 引言

在传统地名学研究中,地理学家扮演着收集、归纳并分析地名时空格局的角色,将地名作为探查地方或区域自然、社会历史环境变迁的一种线索。但这种研究范式,其一,仅是描述性的,致使长期以来地名研究处于地理学边缘地位(Zelinsky, 1997)的不利格局,难以得到改善;其二,关注点仅放在作为命名客体的地名本身的语言学或历史地理学层面的属性,忽略了作为命名主体的人或社会群体在地名命名与使用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政治甚至人际冲突等(Kearns et al, 2009)。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尤其是西方地理学界在地名研究上掀起了一股批判转向的浪潮。然而,并非所有的地名命名都带有强烈的批判特性,传统上,地名命名大多与当地环境相结合,多取材于地方的地理环境特征。西方世界以政治寓意作为地名命名、更名的依据最先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中,自18世纪起,在欧洲利用街道名称来庆祝与纪念国家历史中的特定事件或

人物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至此,地名命名开始明显脱离了地方的自然、文史,转而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当官方对旧地名进行变更并重新赋予新地名时,地名变迁过程不再适合单纯用“自然”演替来理解与诠释,这是西方批判地名学产生的社会渊源(叶韵翠, 2013)。批判地名学已不那么重视地名本身,而是聚焦于命名的文化政治层面(Rose-Redwood et al, 2010)。地名也不是消极的空间指位符号,而是主动地参与到地方创造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社会能动性(Azaryahu, 2011)。目前,传统范式占据国内地名研究的主导地位,对现代地名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均缺乏突破(李鹏等, 2015),也无法从深层次阐释市场经济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地名景观剧烈变迁的动因,而地名学的批判转向将给予国内研究者有益的启示。

2 国外批判地名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对地

收稿日期:2016-03;修订日期:2016-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39);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571139; The Graduate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Project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作者简介:纪小美(1988-),女,福建福清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 E-mail: zhangyuge20105@sina.cn。

通讯作者:陶卓民(1963-),男,江苏苏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经济与市场, E-mail: taozm@tom.com。

引用格式:纪小美,王卫平,陈洁,等. 2016. 批判转向以来地名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35(7): 910-919. [Ji X M, Wang W P, Chen J, et al. 2016.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oponymy research since the 1980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7): 910-919.]. DOI: 10.18306/dlkxjz.2016.07.012

名学的传统范式进行了批判转向,产生了批判地名学。作为西方批判地名研究领军人物的Derek Alderman与Maoz Azaryahu,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以个案实证研究方式涉足该领域。Alderman(1996)主要从事美国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纪念地名的研究,并在1996年发表《创造南方的新纪念地理》一文,为后续的马丁·路德·金地名研究架构建出整体框架。Azaryahu(1997, 2012a)主要研究二战时期的东德与以色列的地名政治,并以后者著称。另一位代表人物Rose-Redwood(2008a, 2008b, 2008c)从2008年开始通过纽约的街道名研究涉足该领域。2010年Rose-Redwood、Alderman、Azaryahu联合发表理论性文章“地名书写地理学:批判地名研究的新方向”(Rose-Redwood et al, 2010),为批判地名学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即地名商品化、尺度问题、地名对日常空间的建构。因而,自2010年起,国外批判地名学主要围绕上述新方向进行深化与拓展。

总体而言,国外批判地名学的研究框架可归结为:①主要涉及权力关系、地方认同、空间政治和地名商品化等课题(Nash, 2009; Azaryahu, 2012a; Light, 2014; Light et al, 2015)。②关注的区域包括非洲、东南亚、南亚等后殖民地区,东欧等后社会主义地区,中东、西欧、大洋洲、东南亚等多族群、多教派地区,美国、南非和澳大利亚等种族矛盾突出的国家(Addleton, 1997; Swanepoel, 2009)。③关注的群体及其斗争形式有:黑人与白人种族矛盾、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宗教斗争、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冲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竞争、华裔与侨居国执政者博弈(Cohen, 1992; Yeoh, 1992; Kearns, 2009);地名商品化过程中政府、私企与市民的命名权博弈(Light, 2014, 2015);地名符号资本利益驱动下的霸权与边缘阶层间经济与社会利益的争夺(Rose-Redwood, 2008);日常生活背景下普通民众的地名认知与使用(Creţan et al, 2016)。④地名景观类型在符号景观基础上增加了声音景观(Kearns, 2009; Shoval, 2013),以及实体空间名称与虚拟网络域名(Light, 2015)。⑤质性研究开始受重视,小尺度的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与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增多(Myers, 1996)。⑥涉及批判理论、符号权力理论、霸权理论、空间生产理论以及社会记忆理论等(Rose-Redwood, 2010)。⑦研究类型以理论探索为主,应用研究开始受重视,主要包括:协调各阶层的地名命名权与使用权,边缘群体争取地名权利的民主渠

道建设,地名资源的旅游开发,地名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地名在不同维度上的效益冲突及调节等(Purcell, 2002; Blomley, 2005)。

2.1 研究内容

2.1.1 政治维度

政治维度是批判地名学最早关注和最为重视的内容。其主要阐释符号象征意涵视角下的地名命名与更名所展现的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施加的规范、压迫与排斥,以及自下而上地反抗与融合。该维度的研究以城市街道为主要尺度。原因在于,城市范围内的地名较其他地名更微观、更易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从而使之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角逐的竞技场(Palonen, 2008)。

(1) 符号统治。在新政党争取统治合法化过程中,通常会将武力统治转变为符号统治,其中变更地名常作为抹去旧政权遗迹和传播新政治理念的手段,进而实现社会操控。Azaryahu(2012b)发现,在德国后纳粹民主重构期间,城市曼海姆采用复原式更名模式,延续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做法;而在社会主义控制下的城市波茨坦采用了激进式,代表了一种未来导向的社会主义变革。

(2) 符号反抗。反支配团体针对地名符号象征意涵的对抗有身体力行的激进式,但更多是一种以情感、认同诉求为动机的符号抵制。当芝加哥政府粗暴地拒绝将Monroe Street更名为Fred Hampton(一位在1969年被芝加哥警察枪杀的黑豹党成员名字)后,伊利诺伊州的黑豹党成员聚集在门罗街游行抗议,并将自制的Hampton路标粘贴到门罗街上(Swanepoel, 2009)。政府当局虽掌握正式的命名权,但地名的使用权一般由当地居民决定,并成为权力弱势者的一种重要抵抗方式。Cohen等(1992)发现,当以色列政府以带有传达犹太人与圣地连结或反映当代犹太复国主义寓意的名称命名原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时,那些失去土地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则试图在地图上继续标出已消失的地名,或者持续使用消失已久的阿拉伯式地名。这里的“地图”已不仅是中立的名称数据的存储,重现于地图上的地名已成为边缘群体抵制霸权的一种常见的手法(Kadmon, 2004),原因在于地图的日常反复使用有助于建立或巩固族群归属感。Yeoh(1992)发现,殖民时期的新加坡并存着官方与华裔族群约定俗成的两套街道指称系统。不仅是地名的文字符号,地名的发音也可作为抵制手段。Kearns等(2009)强调对声音景观的研究,探讨了毛利人如何

通过行使地名“说”的权力而成功地争取到族群认同,以及反抗国家内部殖民主义统治。类似地,当以色列政府为发展阿卡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业而变更了当地地名系统时,当地的阿拉伯居民建立了一套本族群的地名口头表述系统,作为对官方更名的抵制(Shoval, 2013)。

(3) 空间治理。空间治理多涉及国家以现代性的名义对辖境进行理性的空间重构,而这种理性化的地名变更,不仅体现出现代国家治理技术在空间地理上的重新安排,也隐含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话语权,对地名文化生态多样性构成一定的威胁,可能引发民众的抵制。Nash(2009)发现,当英国政府推动以现代化编号的邮递区号系统取代北爱尔兰原先多样化的命名方式时,不同宗教派别团结起来,共同争取具有地方认同感的原地名使用权,并成功地扭转了政府的态度。同样,在曼哈顿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后,当地的精英阶层就极力请愿政府变更原先毫无价值可言的数字式街名,甚至为避免粗俗地名的使用而鼓动政府驱赶当地的黑人贫困居民,以推动街名的符号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并与精英阶层的声望相匹配(Rose-Redwood, 2008c)。

(4) 尺度效应。空间尺度的差异往往对政治地名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因此需要重视地名的尺度效应(Rose-Redwood et al, 2010)。Tretter(2011)发现,以非裔美国人命名的纪念性街路多分布于收入较低的美国南方黑人居住区。而Alderman(2003)将尺度缩小到非裔美国人社区时,发现上述街路并非完全集中于经济弱势区域,而是具有一定的镶嵌性,街路的规格、等级及其空间上是否穿越不同种族社区均存在尺度差异。

2.1.2 社会维度

2010年前,社会维度研究主要探讨支配团体与反支配团体针对地名符号象征意涵的对抗,既强调自上至下贯彻的地名政策,更强调的是一种以情感、认同诉求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地方反馈力量(黄雯娟, 2014)。2010年后,则倾向于关注居民的日常地名实践及其对官方变更地名所作出的响应。社会维度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公平、社会认同与日常实践等方面的内容。

(1) 社会公平。Alderman等(2013)以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下文简称“金”)命名的街名景观历程为例,分析了社会公平视角下的命名权、公民权和归属问题。他认为地名

命名可作为一种诉求空间公平的途径,地名在构建族群歧视或平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现实空间中,美国白人往往对以“金”命名的街路在位置、数量和规格上加以限制;虚拟空间中,白人阻止黑人以“金”命名网络域名。其意图在于削弱黑人借助地名的符号象征意涵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与边缘化思想模式的行为对白人产生的威胁(Alderman, 2013; Light, 2015)。

(2) 社会认同。David等(2012)强调了当代地方命名实践及其在构建社会关系与重构社会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Guyot等(2007)认为地名反映出地方认同,地名变迁是一个地方或区域内所包含的多重认同的表征,并以地名变迁作为分析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地方认同演变的切入点加以论证。研究发现:多种地名变迁模式共存于当今南非从村落、城镇到国家的各类尺度区域;地名有利于不同尺度上的地方认同的塑造;不同社会阶层对政府变更地名的行为反应不同。Shoval(2013)在实地调研阿卡古城中的阿拉伯居民对政府为发展旅游业而变更街名的响应后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对这些受政府支配或反映异族意志的街名充满敌意,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仅感到不适,收入低者更是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

(3) 日常实践。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对民众地名使用态度的影响,而忽略了习惯这一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在情感表达与空间情感体验中的决定作用(Edensor, 2012)。Light(2014)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为例,探讨当地居民对官方变更旧政权地名的响应与日常实践。研究发现,先前出于纪念共产党领导人而命名的某处市场,虽然在后社会主义阶段重新命名,但原地名仍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Light(2014)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继续使用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地名是一种反对新政权强化新意识形态的体现,而生活习惯与社会心理惯性能更好地解释上述现象,从而打破先前的“反意识形态”说法的偏见。类似地,de Soto(1996)和Rose-Redwood(2008a, 2008b)的研究也发现,习惯这一因素可以解释柏林与纽约的旧地名一直被沿用的原因。

2.1.3 经济维度

2010年以后,经济维度研究愈发受关注,主要内容包括命名权商品化和地名商业化开发,涉及地名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及其与社会效益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关于地名的经济权利与

文化权利间的博弈。Rose-Redwood(2011)指出,命名权商品化将改变城市的景观,其中私企将是最大的推手。Light等(2015)探讨了城市地名商品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居民的响应及其区域差异等。研究发现:①私企正在重构从广告牌、机动车体、建筑、地铁站、轨道线路到居民区、大街等不同尺度的城市地名景观,地名的空间生产也由政府组织编撰地图与设置实体标志转向地名空间数据版权私有化及开放式街景地图共享等;②以“金”命名的街道为例,Light指出地名的声誉即沉淀在其背后的符号资本关系到该地段的房价,影响到消费者的空间行为与投资者的决策等;③在不同的国家中,赞助商冠名对居民的地方感、认同、归属与记忆的影响不同(Light et al, 2015)。例如,与美国相比,英国球场的历史更悠久,其名称已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记忆中,球迷较难以接受企业冠名侵占他们的文化符号资本。Light(2014)探讨了不同尺度区域,地名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即奇特地名的本身可以作为旅游吸引物、成为旅游视觉符号系统的开发要素,开发成旅游纪念品能为社区创收,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去理解诸如涂鸦与拍照等的旅游者空间生产与消费行为。

2.1.4 管理维度

近期,国外学者对地名管理维度研究愈发重视。不同维度上的效益冲突、不同阶层间的权利矛盾,通过地名的科学与民主管理可以得到一定的调整或缓和。例如,为满足多族群表达纪念意涵的需要,原本空间上连续的大道有可能被分段命名而对交通导航产生不利影响,引发地名的指位功能与纪念功能间的冲突。Clark等(2009)以澳大利亚国家公园中的土著岩画旅游景区的命名历史为例,探讨了景区命名与游客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景区中多数地名丧失了传达信息的作用,非但没能起到营造积极的、神圣化氛围的功效,反而助长了游客故意损坏景点、毁坏标志与负面口头宣传的行为。Clark等(2009)指出应将地名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管理工具来引导游客行为,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有学者(Herman, 1999; Mitchell, 2003; Cowell, 2004)已意识到,只有最大限度地关注和倾听边缘群体在地名使用过程的意见,尤其需要考虑该群体的地名话语权,打破地名商品化与私有化背景下的阶级与经济权力对公共空间的束缚,才能应用已有的法律条款保障边缘群体的地名权益。在命名的程序公平方面,Purcell(2002)和Blomley(2005)建议,应该将新自

由主义管治、所有权的空间分割与公民增权、削权相结合;在命名的分布公平方面,既应考虑地名景观重构过程中如何反映以及给予先前受压制的族群以表达其文化认同的话语权,也应关注城市内部地名的比例结构与空间分布,以及地名在排斥或提升从属群体合法性的作用。Alderman(2002)指出,若不考虑与种族、性别和阶级有关的地名空间分布,可能会加剧社会隔离。

2.2 研究评价

综上所述,批判转向下的国外地名研究实质是反映在资本、权力与认同框架下,不同社会阶层以地名符号为媒介展开的博弈,涉及多种维度,且多维度融合的趋势已显现。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①经济维度仍有待拓展与深化。尤其是命名权商品化对城市景观的作用机理有待深入阐释。例如,市政当局对于拍卖地名命名权的态度以及遴选赞助商的标准,尤其是否要求赞助商应尊重那些已根植于当地地名景观中的文化认同;地名公权转化成赞助商私权的法理依据及其影响。②近年来对管理维度的重视有所增强,但仍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也制约了批判地名学的社会应用价值的发挥。例如,命名权交易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当地居民社会记忆和情感认同(Light et al, 2015)间的矛盾已为学者所关注,但目前还尚无可操作性较强的对策研究。③日常生活环境下,居民对命名及更名的接受、协商或拒绝微观尺度上的研究已为学者(Light et al, 2014; Crețan et al, 2016)所提倡,但相关成果还不多见,尤其对非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重视仍不足。

3 国内批判地名学研究述评

比较而言,当前国内的地名研究还未出现明显的批判转向,但目前政区更名、地名商品化、地名争夺、地名与文化认同等研究均可归入批判地名学的范畴。为方便比较批判转向以来,中外地名学发展的异同,亦将国内的相关研究按上述4个维度进行划分。

3.1 政治维度

国内外地名政治研究在尺度与利益主体上存在一定差异。国外学者主要以城市、街区为空间尺度,涉及包括市政当局、投资商、精英、普通居民以及不同宗教、政治取向族群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国内相关研究以县及以上政区尺度为主,近期对城市

尺度日益重视,国家、政府是占主导地位的利益相关者,近期对不同社会阶层已有所重视。在县域尺度上,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1985)指出,历史上存在因避封建王朝帝王的名讳、为彰显统治者恩泽和为纪念革命先烈而更改县名等政治现象。在城市尺度上,刘博等(2014)对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的文化政治过程进行网络文本解读。发现相比于西方社会,国内民众通常采取非抵抗式的网络话语等相对温和与隐性的方式来参与地方命名过程,尽管可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地方的最终命名主要取决于相关权力机构。纪小美等(2015)对清末以来福州城区地名演变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执政阶层、特权阶层与市民阶层借助地名表达不同政治立场。黄雯娟(2014)和廖秋娥(2005)讨论了不同政权治理下,台东与台北街道命名策略、更名原则及其地名的空间权力象征寓意的变迁。研究表明:光复后台湾城市街道名称变迁剧烈,其命名与更名受执政当局的文化、政治意志所主导,而与居民和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居民对地方的认同感越发受到削弱等。陈蕴茜(2009)对近代南京地名空间存在形式以及政治内涵进行了探讨;胡箫白(2010)通过对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地名框架结构的重新剖析,阐述了南京是如何通过规范地名结构进而产生一定的政治示范作用。研究指出,当时的“国都”南京为凸显孙中山“符号”,出现了大量以“中山”命名的日常生活、休闲娱乐与教育等城市功能空间。这些地名不仅依赖于表面、直观的信息传达,更通过空间定位、空间群落,加强了孙中山符号的存在感,使整个南京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中山纪念空间。李鹏等(2015)采取文化政治分析的逻辑线索,通过从化温泉这一著名旅游地的地名变更过程,解读地方称谓的变迁和意义的再生产过程,并解读地名的意义再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最后指出中西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地名争夺”的态度差异,即西方反应积极甚至激进,而中方相对消极。

3.2 社会维度

地名与新型城镇化倡导的“记得住乡愁”相结合,是当前国内地名研究在社会维度上重大且迫切的课题。乡愁是一种身处异乡、怀念故土的独特文化与地方认同,是一种身份转换、空间错位之后的心理纠结(张祖群, 2014)。地名是社会记忆传承的载体与社会空间秩序建构方式之一(Schwartz, 1996),而社会记忆是传承地方文化,凝聚地方认同的重要途径。当地名与地方逐渐融合并获得广泛

认可后,地名进入当地居民集体记忆中进而产生情感依恋。韦谢等(2016)从城乡历史地名的延续、更替与消失的视角,透视上海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记忆及地方史的建构与割裂。陈佳穗(2008)从地名传说中的“集体性”本质出发透过各类传说内容与情节的分析与归纳,探讨台湾地名传说所反映的居民集体意识与思想逻辑,研究发现:居民的一部分生活实践与经验,经由集体意识的积累,透过地名传说的流传而代代相传,从而实现社会记忆的传承。总体来看,相比国外,目前国内人文地理学者对地名在社会记忆、地方认同中的建构作用关注极为不足,亟待引起重视。

3.3 经济维度

经济维度上的地名研究,目前国内外研究较为相似,涉及地名商品化开发与利用、命名权商品化、旅游地名与地名争夺等内容。

地名商品化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有其重大的现实需求性。地名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具有很高的公共认知度,充分利用其优势可以在市场上抢占先机。地名商品化主要表现为:地名资源商业化开发、城市地名营销、公共空间冠名权交易等。

地名商业化是开发与利用地名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具体表现为将地名注册为商标、申请为地理标志产品、作为货源标记等。王荣(2010)在探讨宁夏盐池县地名资源开发时,发现将“盐池”地名注册成商标以及申请到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后,盐池滩羊的市场价值剧增。近年来地名商标与地理标志成为地名研究的热点话题,学术界展开了对地名是否可作为商标的法理依据,地理标志产品的地域分布(郭泉恩等, 2013)、经济效应与市场认可,地名商标与地理标志冲突的表现、成因与对策等方面的探讨。

目前,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将地名当作商品推向市场进行交易,将街路、交通场站、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的命名权向国内外公开招标拍卖,以缓解财政压力。尤其重庆、南京、武汉等地铁新兴城市的地铁站点冠名权拍卖成为近年来一大社会热点话题。例如“周黑鸭”以500万获得武汉地铁一号线江汉路站的冠名权,此消息一出,一天内有近3万人次参加了微博讨论,众多网友以调侃的方式表示了不满。最后迫于舆论压力,武汉地铁公司取消所有站点的冠名。褚亚平(1996)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地名应有商品地名与非商品地名之分,企业冠名权应限于那些新建、长期未命名或有必要更名的

街路,并尽量保持其地名的相对稳定性;而那些能够反映城市历史文化、群众认同感强以及体现“地方性”(周尚意等,2007)的地名,不应纳入有偿命名范围中。

在旅游方面,相比国外更关注景区(点)尺度与当地居民的响应,国内更重视政区尺度与地方政府间关于地名符号资本的争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旅游大规模兴起时期的旅游地更名热,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首次出现,涉及政区数量多,影响深远,引发了社会各界诸多争议。合理的旅游城市更名值得肯定与倡导,因为以旅游地命名政区是一种引导旅游者目的地决策的低成本且高效率的策略,不仅迎合了当前市场形象导向的旅游时代需求,也彰显了地方政府的城市品牌营销意识,有助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一些学者探讨了旅游地行政区划调整与更名对旅游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徐嵩龄(2005)和范今朝等(2009)认为,政区改名对旅游地内部其他遗产产生遮蔽,对遗产非物质原真性产生不利影响;张朝枝(2006)对张家界市的政区变更分析表明:若对以自然著称而缺乏文化积淀的遗产地,为管理上的便利而进行区域整合以及将行政区划名称与旅游目的地统一起来,有利于行政管理及对该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有学者(周尚意等,2007;赵玉萍,2008;范今朝等,2009)提议旅游城市更名要兼顾历史与现实,要加强市场调查,在变更前期应当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以当地社区居民的意愿为重要依据等。

地名的唯一性使其作为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时常引发邻近地区间的地名争夺。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旅游经济“井喷”的刺激下各地地名争夺愈演愈烈。以“夜郎”之争为例,在夜郎国遗址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湖南的新晃县已“先发制人”:2010年斥资50亿元筹建“夜郎古国”,规划占地30 km²的“夜郎文化旅游”项目,欲率先打造“夜郎文化休闲度假区”。而该县作为年财政收入仅7000多万的贫困县,与50亿投资额形成强烈反差,引发外界质疑。贵州的桐梓县则抢先将具有排他性质的“古夜郎王朝”商标注册成功,而“夜郎”这个品牌价值预估达700亿元。贵州的赫章县更是把“争取更名为夜郎县”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地名争夺战的根源在于地名品牌的市场价值与经济利益,从而促使各地政府纷纷利用这张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进行城市营销。对此,学者纷纷呼吁:挖掘地名等历史文化资源应建立在史实基础

上,兼顾经济与社会效应;应防止文化本身的价值被市场因素所异化;建立本地居民认同感,争取民众支持(胡秋春,2010;谢倩,2012;毕剑,2013)。

3.4 管理维度

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大陆的地名学在较长时间内仍需以传统范式为基础,以地名规划与管理为核心,以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地名的需求。因此,与国外相比,目前中国大陆对地名管理维度课题更为重视。冯金喜(1996)指出,城市大型建筑物名称一般由房产开发商或房产权属单位擅自、随意命名,“大洋古重怪”地名的涌现,既是某些国人的文化不自信与崇洋媚外心理的反映,也加剧了人与地的情感分离。还出现了诸如广场、花园、城等不规范通名的泛滥,易诱发商业欺诈行为,损害消费者权益。吕静(2007)探讨了中国地名管理过程不民主的现象及其危害,并引荐欧盟成员国的做法,认为地名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决策不仅不会削弱科学决策,而且还会促进科学决策,最后提出实现中国地名管理民主化的途径。地名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化背景下诸多地区会遇到历史或传统地名的继承和保护问题,吴朋飞(2011)以古都开封为例,针对城市现代化建设中老地名的消失,“洋化”与“西化”割断历史文脉以及地名不规范使用等问题,提出了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对策。此外,城镇化浪潮中存在着命名简单粗犷,盲目模仿,“千城一面”等降低了地方辨识度,掩盖城市特色等问题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纷纷强调地名规划的重要性,并展开了地名规划的实证与理论研究(王长松等,2013)。

4 启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给国内地名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命题和新视角,给地名的管理实践提出新挑战和新问题。尤其地名资源的商业化开发与利用有其现实需求,而作为公权的地名,其开发必然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重权利的竞争与协调。同时,快速城镇化作用下的城乡地理实体的更替与空间功能的转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地名效益的全面发挥、社会群体关于地名权利的角力与调和均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地名景观剧烈变迁的深层次动因。而这些问题及其内在机理是传统范式难以完全阐释的,需要借鉴批判地名学的相关理论

与方法。然而,目前批判地名学主要根植于后殖民主义、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中,对处于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而言,需要辩证对待批判范式。因此,本文结合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快速城镇化的特殊背景,对国内地名学研究进行如下展望。

(1) 政治与管理维度。随着社会民主化建设进程的深化,针对以往政府掌控绝对命名权与冠名交易权带来的弊端,一些地方开始以听证制与征求社会意见的形式进行地名的民主体管理。其中倾向于通过数字化平台征求群众意见,然而,这种做法无形中剥夺了处于信息鸿沟中的弱势群体的地名话语权。因此,可借鉴国外的批判范式,加强对各类弱势群体的地名权利保障渠道的研究,推动国内地名民主管理的实践发展。

(2) 社会维度。目前以情感认同作为争夺命名权动机的案例已大量见于国内媒体报道,其中又以地铁站点命名权的争夺(刘博等, 2014)最为激烈,涉及市民、运营商、政府与冠名企业间,大学之间,大学与社区居民间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对地名符号资本的博弈,未来可作为国内批判地名学的经典课题。中华民族认同方面,尤其台湾与闽粤地名文化的同根同源已成为学界共识,两岸多次开展“同名村”的联谊活动,对巩固两岸文化认同有重大意义。此外,华人华侨的探亲访祖在中国入境客源市场中占重要地位。然而,在国内快速城镇化浪潮下,众多古村落面临消亡,老地名也往往随之消失,这些承载着乡愁的老地名在华人华侨寻根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这一问题亟待国内学界重视。

(3) 经济维度。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决定了与地名相关的经济问题为国内地名学的重心,同时这方面的研究亦需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为:①仍具较浓厚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即政府仍掌控较大的资源配置权,从而在利益竞争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也就是国内地名变更与争夺的主导方往往是各级政府机构而普通民众相对消极的原因之一。②利益主体多元化与共同利益主体并存。例如,地名作为公权,商标等地名商业化开发模式属于私权,为平衡商标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目前国内通行的做法是不完全禁止将地名作为商标注册,但又有一定限制。因此,地名经济维度的探讨可借鉴博弈论,探讨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制约下,如何在

协调利益相关者地名使用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名的经济效益。此外,公共地名数据版权私有化、网络域名投资与开发等也是网络时代国内地名研究可拓展的新兴话题。

(4) 研究方法 with 尺度。在巩固传统地名探源、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应积极借鉴批判地名学倡导的小尺度实地调研法,有助于深入探查日常生活中社会各阶层对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地名剧烈变迁的响应方式与作用机理。加强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的运用,探究地名及其符号价值的认知对于居民归属感、消费者空间行为与投资者区位选择等的影响机制,提升地名研究在城镇规划中的先导作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毕剑. 2013. 旅游“井喷”背景下的“名人故里之争”研究[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4(4): 423-428. [Bi J. 2013. Lvyou “jingpen” beijing xia de “mingren guli zhi-zheng” yanjiu[J]. Journal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4(4): 423-428.]
- 陈佳穗. 2008. 台湾地名传说所反映之居民集体意识研究[J]. 南亚学报, 30: 359-378. [Chen C S. 2008. Study o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by the fable of the geographic name in Taiwan[J]. Journal of South Asia, 30: 359-378.]
- 陈蕴茜. 2009. 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Chen Y Q. 2009. Chongbai yu jiyi: Sunzhongshan fuhao de jiangou yu chuanbo[M]. Nanjing,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褚亚平. 1996. 城市地名商品化与地名管理法制化[J]. 中国地名, (1): 4-6. [Chu Y P. 1996. Chengshi diming shangpinhua yu diming guanli fazhizhua[J]. China Place Name, (1): 4-6.]
- 范今朝, 张锦玲, 刘盈军. 2009. 行政区划的调整与遗产原真性的保护: 以遗产(地)所在政区的更名对区域遗产保护的负面影响为例[J]. 经济地理, 29(9): 1558-1563. [Fan J Z, Zhang J L, Liu Y J. 2009. The influence of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n the conversation of heritage and its authentic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 Economic Geography, 29(9): 1558-1563.]
- 冯金喜. 1996. 城镇地名管理中的几个问题及其对策[J]. 中国地名, (4): 8-10. [Feng J X. 1996. Chengzhen diming guanli zhong de jige wenti jiqi duice[J]. China Place Name, (4): 8-10.]
- 郭泉恩, 钟业喜, 黄哲明, 等. 2013. 江西省地理标志产品培育及其空间分布[J]. 热带地理, 33(4): 444-449. [Guo Q E, Zhong Y X, Huang Z M, et al. 2013. Products of geo-

- 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Jiangxi Province[J]. *Tropical Geography*, 33(4): 444-449.]
- 胡秋春. 2010. 名人故里之争, 到底在争什么[J]. *学习月刊*, (6): 37-39. [Hu Q C. 2010. Mingren guli zhizheng, daodi zai zheng shenme[J]. *Learning Issue*, (6): 37-39.]
- 胡箫白. 2010. 民国时期南京地名的文化与政治解读[J]. *中国地名*, (3): 15-22. [Hu X B. 2010. Minguo shiqi Nanjing diming de wenhua yu zhengzhi jiedu[J]. *China Place Name*, (3): 15-22.]
- 黄雯娟. 2014. 台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间政治[J]. *地理学报(中国台湾)*, 73: 79-105. [Huang W J. 2014.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elation to street naming in Taipei City[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Taiwan, China)*, 73: 79-105.]
- 纪小美, 陶卓民, 李涛, 等. 2015. 近代以来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2(11): 101-108. [Ji X M, Tao Z M, Li T, et al. 2015. The study on spatial politics evolution of place-name in Fuzhou City since the Opium War[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2(11): 101-108.]
- 李鹏, 封丹. 2015. 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 以从化温泉为例[J]. *人文地理*, 30(2): 58-64. [Li P, Feng D. 2015. The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Changing place name and reproduction of meaning for Conghua Hotspring[J]. *Human Geography*, 30(2): 58-64.]
- 廖秋娥. 2005. 地名权的历史地理面向: 以台东市的街道名为例[J]. *台东文献*, (11): 84-97. [Liao C E. 2005. Dimingquan de lishi dili mianxiang: Yi Taidongshi de jiedaoming weili[J]. *Taidong Literature*, (11): 84-97.]
- 刘博, 朱竑. 2014. 批判视角下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研究[J]. *地理科学*, 34(9): 1139-1144. [Liu B, Zhu H. 2014. Naming and renaming: A critical study on Guangzhou metro station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4(9): 1139-1144.]
- 吕静. 2007. 试谈在地名管理中如何发扬民主[J]. *中国民政*, (6): 37-38. [Lv J. 2007. Shitan zai diming guanli zhong ruhe fayang minzhu[J]. *China Civil Affairs*, (6): 37-38.]
- 史念海. 1985. 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 36-47. [Shi N H. 1985. Lun diming de yanjiu he youguan guilv de tansuo[J].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1): 36-47.]
- 王长松, 陈喜波, 韩光辉. 2013. 城镇地名规划研究: 以北京通州、大兴和平谷新城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8): 26-29. [Wang C S, Chen X B, Han G H. 2013. Research on the urban toponymy planning: A case study on Beijing new cities of Tongzhou, Daxing and Pinggu[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8): 26-29.]
- 王荣. 2010. 地名与人地关系实证研究: 以盐池县为例[D]. 银川: 宁夏大学. [Wang R. 2010. Diming yu rendi guanxi shizheng yanjiu: Yi Yanchixian weili[D]. Yinchuan, China: Ningxia University.]
- 韦谢. 2016. 城市地名变迁与社会记忆的建构: 基于《紫堤村志》的分析[J]. *中国名城*, (3): 53-56. [Wei X. 2016. The change of urban place na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Ziti Country Annals[J]. *China Ancient City*, (3): 53-56.]
- 吴鹏飞. 2011. 论城市现代化背景下古都地名生存困境与对策[J]. *中国名城*, (9): 38-42. [Wu P F. 2011. On the survival dilemma of ancient capital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J]. *China Ancient City*, (9): 38-42.]
- 谢倩. 2012. 城市营销视角下的历史名人故里之争的思考[J]. *知识经济*, (12): 72-73, 81. [Xie Q. 2012. Chengshi yingxiao shijiao xia de lishi mingren guli zhizheng de sikao[J]. *Knowledge Economy*, (12): 72-73, 81.]
- 徐嵩龄. 2005. 第三国策: 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34-254. [Xu S L. 2005. Disanguoce: Lun Zhongguo wenhua yu ziran yichan baohu[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234-254.]
- 叶韵翠. 2013. 批判地名学: 国家与地方、族群的对话[J]. *地理学报(中国台湾)*, 68: 69-87. [Yeh Y T. 2013. The critical toponymy: A dialogue of nation, place and ethnic group[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Taiwan, China)*, 68: 69-87.]
- 张朝枝. 2006. 旅游与遗产保护: 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 with 实证[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09-162. [Zhang C Z. 2006. Tourism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Theory and empiricism under the view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M]. Beijing, China: China Travel & Tourism Press: 109-162.]
- 张祖群. 2014. 《舌尖上的中国 II (脚步)》评析: 中国文化地理场景中的“乡愁”[J]. *电影评价*, (8): 1-6. [Zhang Z Q. 2014. 《Shejian shang de Zhongguo II (jiaobu)》 pingxi: Zhongguo wehua dili changjingzhong de “xiangchou”[J]. *Movie Review*, (8): 1-6.]
- 赵玉萍. 2008. 旅游城市命名、更名的冷思考[J]. *中国地名*, (12): 63-64. [Zhao Y P. 2008. Lvyou chengshi mingming, gengming de lengsikao[J]. *China Place Name*, (12): 63-64.]
- 周尚意, 吴莉萍, 杨飞, 等. 2007. 论城市实体空间变化与历史地名保护的关系: 以北京二环以内地区为例[J]. *中国地名*, (1): 66-67. [Zhou S Y, Wu L P, Yang F, et al. 2007. Lun chengshi shiti kongjian bianhua yu lishi diming bao-hu de guanxi: Yi Beijing erhuan yinei diqu weili[J]. *China Place Name*, (1): 66-67.]
- Addleton J. 1997. The fate of British place names in Pakistan [J]. *Asian Affairs*, 8(1): 37-44.
- Alderman D H. 1996. Creating a new geography of memory in

- the south: (Re)Naming of streets in honor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J]. *Southeastern Geographer*, 36(1): 51-69.
- Alderman D H. 2002. School names as cultural arenas: The naming of U.S. public schools after Martin Luther King, Jr.[J]. *Urban Geography*, 23(7): 601-626.
- Alderman D H. 2003. Street names and the scaling of memory: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within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J]. *Area*, 35(2): 163-173.
- Alderman D H, Inwood J. 2013. Street na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Spatial injustices in the toponymic commemoration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4(2): 211-233.
- Azaryahu M. 1997.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es: The case of East Berlin[J]. *Political Geography*, 16(6): 479-493.
- Azaryahu M. 2011. The critical turn and beyond: The case of commemorative street naming[J].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0(1): 28-33.
- Azaryahu M. 2012a. Rabin's road: The politics of toponymic commemoration of Yitzhak Rabin in Israel[J]. *Political Geography*, 31(2): 73-82.
- Azaryahu M. 2012b. Renaming the past in post-Nazi Germany: Insights into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ing in Mannheim and Potsdam[J]. *Cultural Geographies*, 19(3): 385-400.
- Blomley N. 2005. Remember propert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2): 125-127.
- Clark I D. 2009. Naming sites: Names as management tools in indigenous tourism sites: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J]. *Tourism Management*, 30(1): 109-111.
- Cohen S B, Kliot N. 1992. Place-names in Israel's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administered territori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4): 653-680.
- Cowell A. 2004. Arapaho placenames in Colorado: Indigenous mapping, white remaking[J]. *Names*, 52(1): 21-41.
- Crețan R, Matthews P W. 2016. Popular responses to city-text changes: Street na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practicality in a post-socialist martyr city[J]. *Area*, 48(1): 92-102.
- David J, Mácha P. 2012. The possibilities for studying place names in relation to landscape, space and identity[J]. *Acta Onomastica*, 53: 28-45.
- de Soto H G. 1996. (Re)Inventing Berlin: Dialectics of power, symbols and pasts, 1990-1995[J]. *City & Society*, 8(1): 29-49.
- Edensor T. 2012. Illuminated atmospheres: Anticipating and reproducing the flow of affective experience in Blackpool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0(6): 1103-1122.
- Guyot S, Seethal C. 2007. Identity of place, places of identities: Change of place name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J]. *South African Geographical Journal*, 89(1): 55-63.
- Herman R D K. 1999. The Aloha State: Place names and the anti-conquest of Hawai'i[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9(1): 76-102.
- Kadmon N. 2004. Toponymy and geopolitics: The political use- and misuse- of geographical names[J].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41(2): 85-87.
- Kearns R A, Berg L D. 2009. Proclaiming plac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place name pronunciation[M]//Berg L D, Vuolteenaho J. *Critical toponymies: The contested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Oxford, UK: Ashgate: 153-177.
- Light D. 2014. Tourism and toponymy: Commodifying and consuming place names[J]. *Tourism Geographies*, 16(1): 141-156.
- Light D, Young C. 2014. Habit, memor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socialist-era street names in postsocialist Bucharest, Romania[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4(3): 668-685.
- Light D, Young C. 2015. Toponymy as commodity: Explo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urban place na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3): 435-450.
- Mitchell D. 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M]. New York: Guilford: 45-63.
- Myers G A. 1996. Naming and placing the other: Power and the urban landscape in Zanzibar[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87(3): 237-246.
- Nash C. 2009. Irish place-names: Post-colonial locations[M]//Berg L D, Vuolteenaho J. *Critical toponymies: The contested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 Oxford, UK: Ashgate: 137-152.
- Palonen E. 2008. The city-text in post-communist Budapest: Street name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J]. *GeoJournal*, 73(3): 219-230.
- Purcell M. 2002. Excavating Lefebvre: The right to the city and its urban politics of the inhabitant[J]. *GeoJournal*, 58(2-3): 99-108.
- Rose-Redwood R. 2008a. From number to name: Symbolic capital, places of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renaming in New York City[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9(4): 431-452.
- Rose-Redwood R. 2008b. Indexing the great ledger of the community: Urban house numbering, city director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tial legibility[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4(2): 286-310.
- Rose-Redwood R. 2008c. "Sixth Avenue is now a memory": Regimes of spatial inscription and the performative limits

- of the official city- text[J]. *Political Geography*, 27(8): 875-894.
- Rose-Redwood R. 2011. Rethinking the agenda of political toponymy[J].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0(1): 34-41.
- Rose-Redwood R, Alderman D, Azaryahu M. 2010. Geographies of toponymic inscription: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4): 453-470.
- Schwartz B. 1996. Memory as a cultural system: 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908-927.
- Shoval N. 2013. Street-naming,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flict: The case of the Old City of Acre/Akko/Akk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8(4): 612-626.
- Swanepoel N. 2009. Capital letters: Material dissent and place name change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2005-2006[J].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32(3-4): 95-105.
- Tretter E M. 2011. The power of naming: The toponymic geographies of commemorated African-Americans[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3(1): 34-54.
- Yeoh B S A. 1992. Street names in colonial Singapore[J]. *Geographical Review*, 82(3): 313-322.
- Zelinsky W. 1997. Along the frontiers of name geography[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9(4): 465-466.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oponymy research since the 1980s

Ji Xiaomei¹, WANG Weiping¹, CHEN Jie¹, TAO Zhuomin^{1*}, FU Yeqin²

(1.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Tourism College,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international toponymy research by scholars including human geographers has shifted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using descriptive method to exploring origin, classification,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of individual place name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ives birth to critical toponymy, and the new paradigm abandoned the pervious popular belief that place name is merely a neutral landmark for indicating geographic location. The new paradigm tends to focus on the dissection of the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s of naming or renaming,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evolution of place-name landscap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power competi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This critical tur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better explain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place-name landscape in Chinese from the 1980s—an era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rapid urbaniz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oponymy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with regard to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dimensions. It then elaborates on the progress of relevant research in Chinese, including name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treets in urban areas, commercialization of place name, competition for place name, place nam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 on. Last,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prospect of critical toponymy in Chinese in line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e the Western critical toponymy as lessons dialectically. 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Chinese toponymic scholars need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coordinating the other dimensions; on the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dimensions, securing the naming right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should be of higher concern; with regard to the social aspect, the role of place name in cultural identity deserves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Key words: toponymy research; critical turn; review; prospect